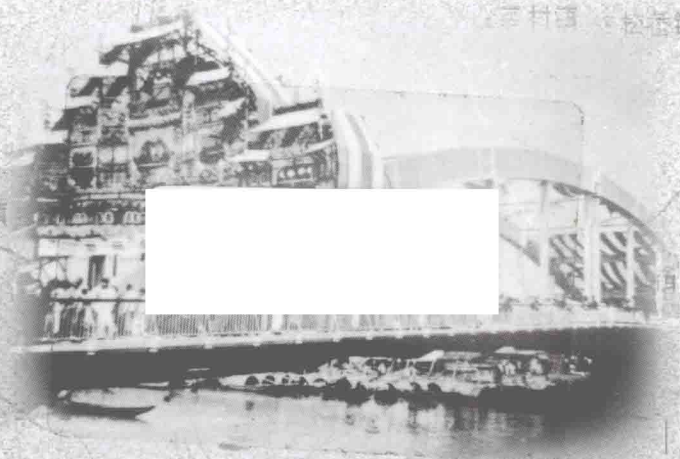


宁波文化研究工程·历史文献整理

宁波灵桥史料选辑

NINGBO LINGQIAO SHILIAO XUANJI

宁波市档案馆 编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宁波灵桥史料选辑

NINGBO LINGQIAO SHILIAO XUANJI



宁波市档案馆 编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宁波灵桥史料选辑 / 宁波市档案馆编. —杭州:
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308-14581-7

I. ①宁… II. ①宁… III. ①古建筑—桥—史料—宁
波市 IV. ①K928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70104 号

宁波灵桥史料选辑

宁波市档案馆 编

责任编辑 田 华

封面设计 木 夕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24.25

字 数 42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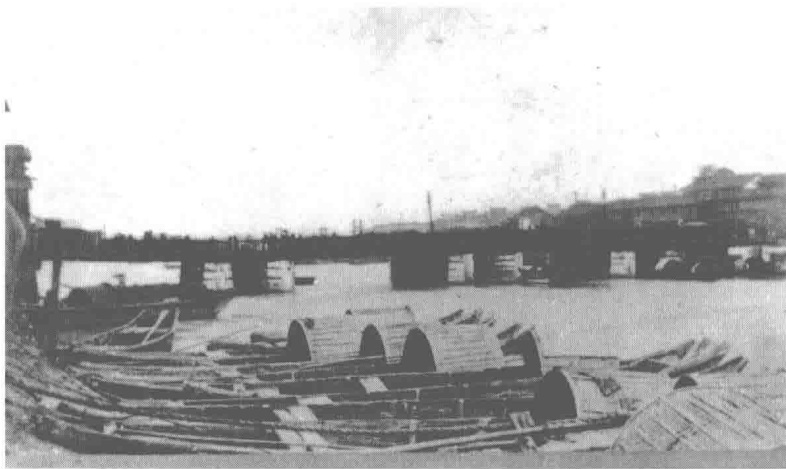
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4581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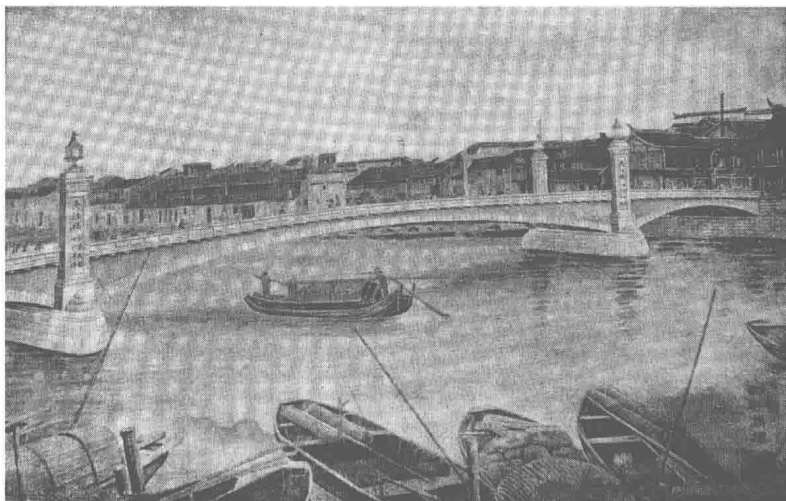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7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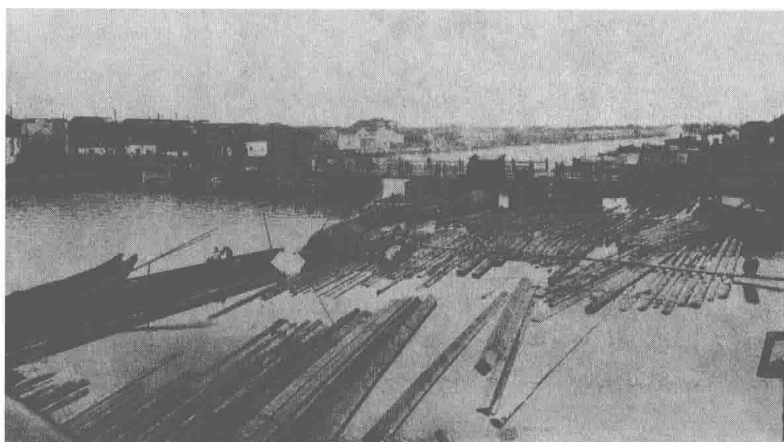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(0571)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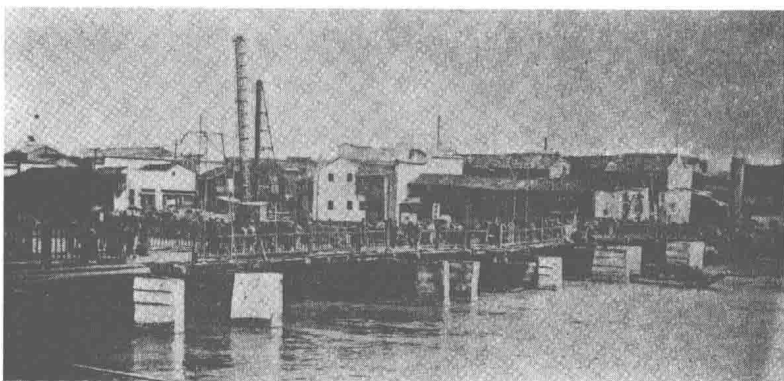
灵桥（浮桥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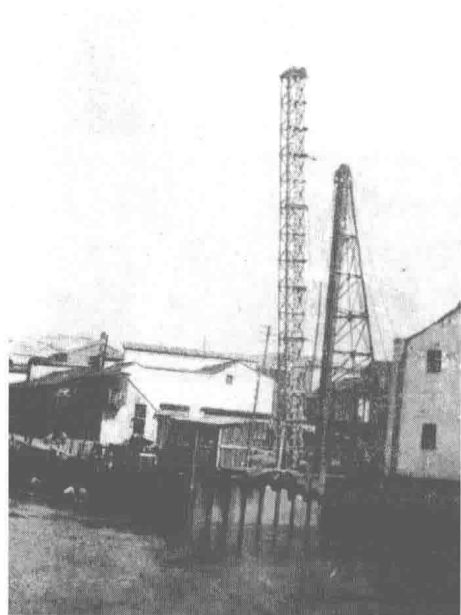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第二次筹备改建时设计的桥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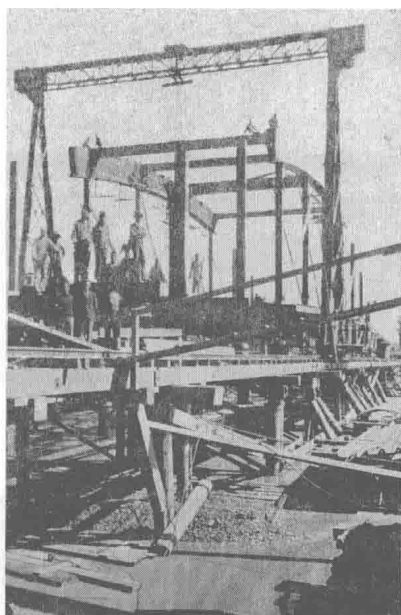
钢拱灵桥建造之前的浮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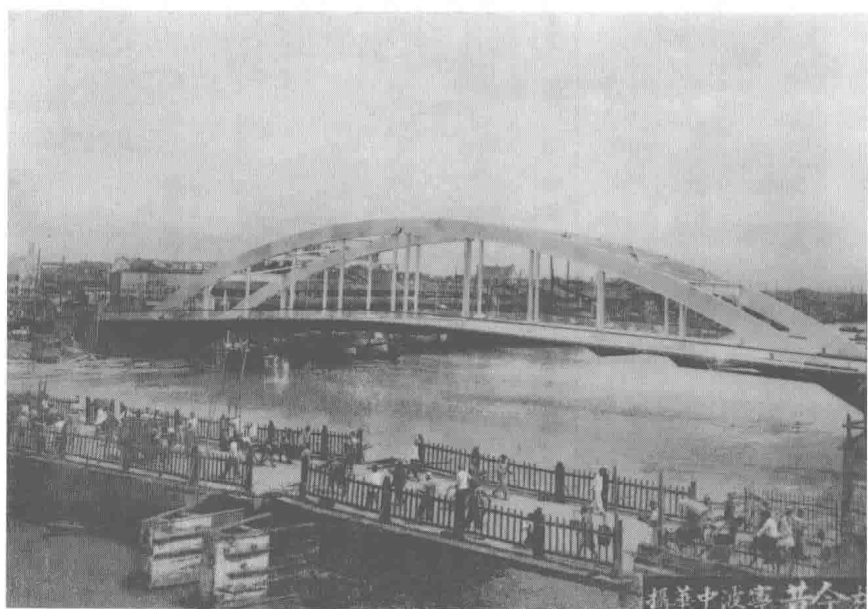
灵桥改建时的临时浮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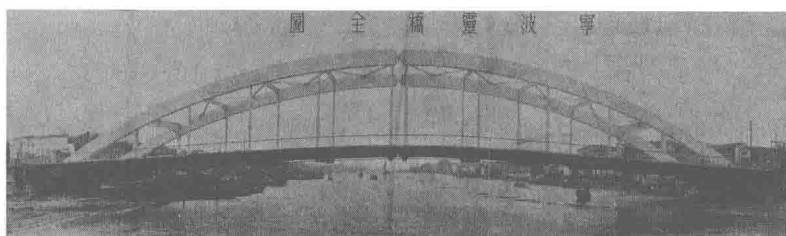
灵桥改建工程开始——打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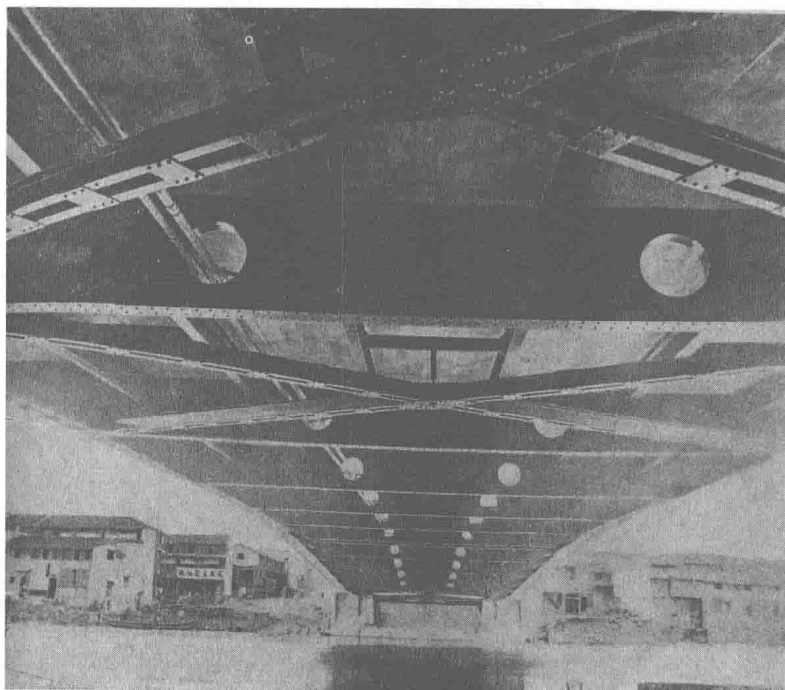
灵桥改建时施工情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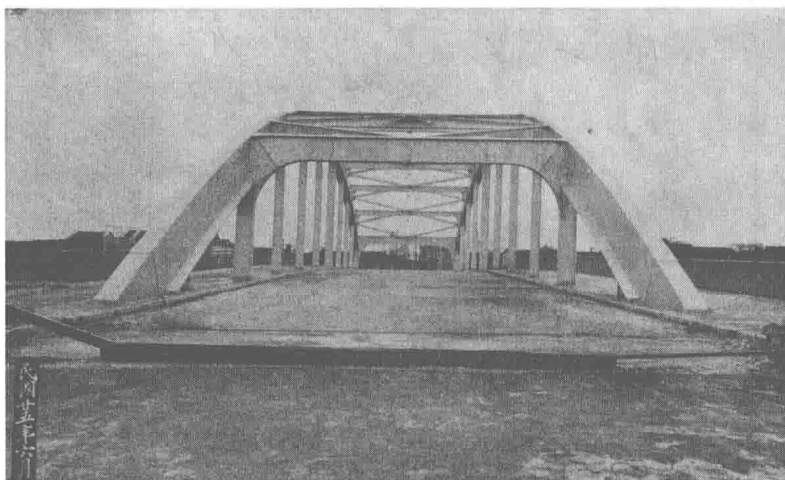
钢拱灵桥刚建成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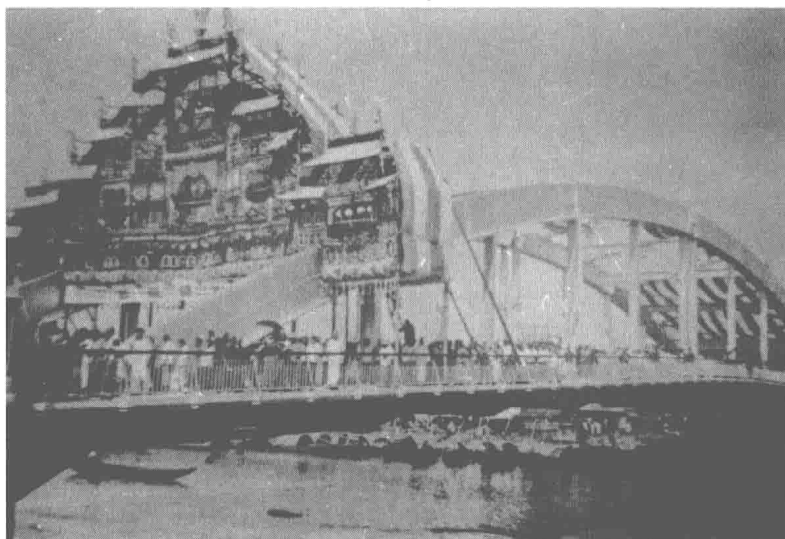
灵桥全图



灵桥桥底图



灵桥侧面图



1936年6月，灵桥通车典礼



1941 年日军盘踞下的宁波灵桥一带



1949 年 5 月，宁波解放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行经过灵桥时的情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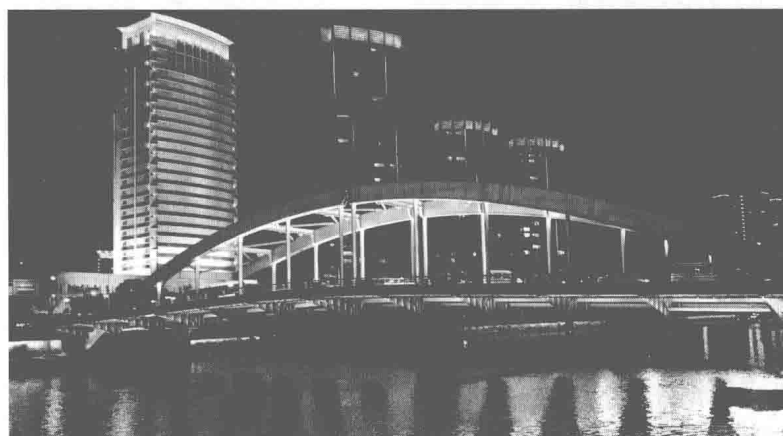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初期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灵桥一带



1983 年拍摄的灵桥及江东后塘街一带



1994 年灵桥正在扩建



2011 年 5 月拍摄的灵桥

序 一

宁波市档案馆馆长 孙伟良

记得一位经常泡档案馆的学者对我说过：“宁波市档案馆是史料的‘米缸’，让学者治史尽展拳脚。”我很认同，其实档案馆岂止是史料的“米缸”，更贴切一点说应该是史料的“粮仓”。地方国家综合档案馆依法集中收集保管地方各类史料，史料的时间跨度没有限制，以传统纸质文字史料为主，图片、声像、网页和社会管理大数据都逐步纳入档案收集保管的范围。档案馆在重视履行记录历史、传承文明的职责的同时，近年来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造福社会、服务人民，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将“粮仓”里的精髓挖掘整理出来，让社会共享。

灵桥是宁波人永恒的话题，灵桥史料一直被档案查阅者所追捧。打从三年前灵桥大修消息一出，前来档案馆查阅灵桥史料的人络绎不绝，他们中有记者、有学生、有地方史爱好者等，他们借助于查阅到的史料，各取所需，发表了很多有关灵桥的消息、故事甚至戏说等，但这一些都无法向世人呈现灵桥系统、真实的全貌。我们随后决定，着手宁波灵桥史料编撰工作。

第一步，韩莲亭先生出了大力。老韩与我是同窗，被誉为草根学者，专研《梦窗词》并有专著面世，爱好宁波地方史料研究。我将编撰宁波灵桥史料的打算一透露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立马动手。先是将市档案馆保存的灵桥史料查了个底朝天，或抄录、或复制、或拍摄。再是广泛征集，将散落在档案馆外的有关灵桥研究的内容尽可能收集在一起。两部分内容合起来形成了《宁波灵桥史料选辑》初稿。第二步，俞信芳先生担纲编撰，他是宁波著名文献整理专家，学养深厚，以初稿做底子，去粗存精，删繁就简，细心校注补充，大胆修改删谬，敢于填补本地史学的些许空白，进而以史实揭示宁波人

对灵桥认同感背后的精神内核。终成《宁波灵桥史料选辑》出版稿,历时三年有余。

《宁波灵桥史料选辑》是一部全面记载灵桥身世的书,是一部生动的灵桥百科全书。它奉献给读者的,除了记忆,还有激励。更为可贵的是,在全面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,宁波人的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,完全可从灵桥身上借以灵感,重构宁波人的核心价值观。感谢社会各界在成书过程中给予的支持,感谢市社科联将灵桥史料研究列入2013—2014年度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,感谢王仕龙老师在此过程中给予的指导,感谢宁波市市政管理处、宁波帮博物馆、天一阁博物馆的大力支持,感谢赵军、陈茹、余德富、周建平、水银等社会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。

欢迎全社会继续关注档案馆这个“粮仓”,希望有更多的专家、学者、热心人士到“粮仓”来挖掘、来研究,多端出大餐、美餐,以飨社会。

序 二

俞信芳

建造灵桥之原动力 ——三江口成为宁波政治经济中心

说到宁波灵桥之建造,必须有一个前提,即今桥址东西两岸成为热地。特别是桥西鄞姚二江西南区域(下称:三江口)成为政治、经济中心。论及这一内容,就有两个绕不开的问题需要解决:

一是选定并迁移鄞县县治治所至三江口的日期问题^①。治所迁移时期,我们认为在唐圣历二年(699)。

① 迁治,先是鄞县县治之迁徙,完成于唐圣历二年。《灵应庙记》有记载。《灵应庙记》,宋楼扶所撰。楼扶(1215年3月28日至1265年7月17日),是楼钥之孙。所撰《灵应庙记》,著录于延祐《四明志》卷十五《祠祀考》。此《记》在唐会昌中(843—844),明州刺史张次宗之《鲍郎庙碑(记)》(又称《鲍君祖庙记》)基础上撰写的,这就不免过录了些许唐代之文献。张次宗之《鲍君祖庙记》,据宝庆《四明志》卷一《太守》记载,太守吕昌龄在北宋大观三年(1109)重刻过。可惜此碑今已不可得见。《灵应庙记》提到灵应庙所在地(宝幢鹿山)之县治即将迁移,曰:唐神功元年八月八日(697年8月29日),王降于县东门,托乡童终日而歌曰“吾姓鲍氏,庙食于此。自昔及今,四十余纪。马行水林,县必迁徙。家在鹿山,不堪居止。鄞水西流,北接甬水。给事祖室,实吾之庐。汝为我请,早为改图。待兔化龙,遇齐得王。移汝来封,日月交光。万载无穷,我歌章章。”父老同守仁等告于令柳惠古,乞更置,尉宗鲁贤谓“甬水有杨给事宅,其子承奉郎宏道遂乞舍故父给事郎公遗宅为庙,他无觐:‘特乞子孙嗣掌祠事,其世世无易。’”童谣是人造的,童谣中涉及即将发生的事情,是有其因缘的,他们预感到县治将要迁徙。故曰“马行水林,县必迁徙。家在(宝幢)鹿山,不堪居止”。可见,唐神功元年八月八日,县治依旧在鄞山一带。二年间,灵应庙迁徙。宝庆《四明志》卷十一《郡志·叙祠·灵应庙》曰“唐圣历二年(699),县令柳惠古徙祠于县。会昌中,刺史张次宗记其事。”此说,宝庆《四明志》卷十二《鄞县志》卷一《叙县·沿革论》夹注作“县南有鲍郎庙,《记》云:唐圣历二年(699)县令柳惠古徙祠于县。”是知初置鄞县于此,并指出引自《鲍郎庙记》。但圣历二年迁祠事,楼扶之《记》没有提到。故笔者以为此《记》,当是会昌中(843—844)张次宗刺史撰《鲍郎庙碑》之文。县治迁徙工程,在神功元年八月八日至唐圣历二年(699)两年间完成。

一是设州时期问题^①。设州(指郡、府建置)的时期,我们认为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庚辰(十三日,738年8月3日)。之后又有州治之迁移与县治互换。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一:“明州,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(738年8月3日)析越州鄞县置。以秦昌顺为刺史。大历六年(771)三月因袁晁贼废,长庆元年(821)三月^②,浙东观察使薛戎上言:‘明州北临鄞江,山阻隘,今请移明州于鄞县,置其旧城近南高处置鄞县,’从之。”这时州治在哪里呢?我们认为,也是在鄞山宝幢一带。即宝庆《四明志》卷十二之记载,在“广德湖”文后夹注曰“县南有鲍郎庙记云‘唐圣历二年县令柳惠古徙祠于县。’是知初置鄞州已治此,继废州为鄞县,不复在鄞山之东也”^③。之后又有州治、县治同一地办公,也即“附郭”体制。钱大昕乾隆《鄞县志》卷一《建置沿革》“鄞县之

① 甬上置州,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十七《明州》:“本会稽之鄞县及句章县地也。武德四年(621)于县立鄞州,八年废。”有学者以为这是立州之始。笔者以为,武德四年所立之州,与《隋书》卷三十一《地理·会稽郡》之“句章”相当,是县一级建置,《隋志》曰:“句章,平陈,并余姚、鄞、鄮三县入。”原因是经战乱之后,人口锐减,经济衰退而采取的缩编措施。真正,作为州郡(府)一级建置的是在开元二十六年。《旧唐书》卷九《玄宗本纪》:“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庚辰,分越州置明州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十七《明州》并统计了明州人口数据,曰“元和户四千八十三”。该书凡是州一级建置,都著录开元或元和的户数据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十六《穆宗本纪》:“长庆元年三月丁酉朔〔821年4月6日〕浙东奏移明州于鄞县置。”这时的州治从哪里移到鄞县不很清楚,或从小溪迁出。而鄞县县治,一般认为在今宝幢一带。据《灵应庙记》,在宝幢一带的鄞县县治已经在圣历二年(699)迁至三江口西南位置。如果圣历二年的县治之迁移可以确认的话,长庆元年三月初一之州治移迁至三江口西南也无不可。宋元大家王应麟就是这样认为的,所著《济南陈公东津浮桥记》:“四明自唐长庆初迁州城于鄞城东门外,濒江,民病涉。刺史应彪始建浮桥。”

③ 楼扶的《灵应庙记》有曰:“道浙而东,四明为乐国;由晋以来,灵应为著祠。绵历千载,民依怙若慈父,以其司一城之命,故皆以‘府主’称。”这一“城”字,如果不是府城,那么“府主称”,也就没有基础。可以“以府主称”,意思是鲍盖虽非郡主,当地百姓,把鲍盖神灵视作“府主”供奉的。这一“府主”,就是认作郡庙主神之意。所以笔者以为,地处宝幢之鄞,不仅曾经作为县治所在地,也是府治所在地,才有可能视鲍盖神灵为“府主”。该地不仅是县治所在地,也是州(府)治之所在地。或谓:楼扶所撰之《记》,是为迁徙至今海曙之灵应庙所撰。是时之州治已经在该区了,故以之为“府主”,已经有影射之条件了。曰:楼扶所谓者,前提有“由晋以来”之概括,故所云,不仅仅为南宋也。所以嘉祐间建造在宝幢的“行祠”灵应庙,著录于光绪鄞县志卷五十九,宋万逮《重修宝幢灵隐祠碑》曰:“郡人以府主称,尊之至而敬之笃也。”在市区的大古镇大河路大河桥、聚奎镇贯桥头、太和镇三法卿广济桥,分祀鲍盖的,径称府主庙、府主西殿、府主庙,也就有据了。宋张杲撰《医说》(该书有序作于淳熙己酉,1189)卷十引洪迈(1123—1202)小说《夷坚志戊志·鲍君大王》之管辖权竟大于城隍,曰“吾城中事,乃鲍君大王主之,城隍无预”,则楼扶之说有因也。

附郭,其在唐季乎?”是在试问。其实“鄞县之附郭”在宝幢鄞山已经有过一次。至于在三江口之“鄞县之附郭”在何时,尚未见到明文。后来成为附郭,那也是事实。

三江口选为县治、州治之后。有一组词汇成为热词,曰:

三江口据江海之冲,为善后之备。

有学者多次引用,说出自乾道《四明图经》。经检乾道《四明图经》,没有。只见该书卷一《总叙》曰:

代宗大历六年(771)三月,海寇袁晁作乱于翁山,而鄞久弗能复,乃移治鄞。鄞东取鄞城才三十里。

对此,钱大昕乾隆《鄞县志》卷一《建置沿革》曰:

今考《通鉴》代宗宝应元年(762)十月,袁晁陷四明,李光弼奏擒袁晁,浙东皆平。又阅四年始改大历。大历六年,距擒晁已逾十载矣。鄞为附郭之县岂有久未能复之理?《图经》所言,殆非其实矣。当时县治之移,实以三江口据江海之冲,为善后之备,非因故城未复而别立治也。诸志皆踵《图经》之伪,兹特援正史驳正之。

驳正的是“宝应元年十月,袁晁陷四明”日期与县治迁移之影响,又论述了迁移至三江口的原因,曰“实以三江口据江海之冲,为善后之备”。对迁移治所之日期,还是认同的。在乾隆《鄞县志·凡例》:

汉时鄞城在今县东三十里,所谓鄞山城也。废于隋而复立于唐,其治在小溪。李志谓“徙治故鄞城者”误也。大历中移于三江口,而郡与县分。长庆初(821),州治与县治互易而郡与县仍分。曹志谓“鄞县之附郭始此”,亦误也。鄞县之附郭,其在唐季乎?前志略而不言,近志遂多臆揣,兹特考而正之。

可见“三江口据江海之冲,为善后之备”说,源自钱大昕乾隆《鄞县志》卷一《建置沿革》。移植至乾道《四明图经》,紊也。

钱大昕之“其治在小溪”(今鄞江桥镇,时称:光溪)说。在那里作为州治时间段,应该在武德四年(621)于县立“鄞州”,至它山堰建成于大和七年(833)之间。此前在魏晋时期,作为核心城镇句章,仅是一个县级建置而已。武德四年,光溪镇作为州治所在地,称谓而已。真正的州郡建置,应在开元二十六年七月以后。关于光溪镇之州治说,《四明它山水利备览·积年沙淤

处》有些痕迹，或可参酌，曰：

马家营西至孙家桥五十二丈六尺，孙家桥至许家桥七十丈，许家桥西至潘知府宫前一百丈，潘知府宫前西至万家道头九十丈，万家道头南至吴家桥一百五十四丈八尺，吴家桥南至它山堰口四十七丈。

“潘知府宫”，当是州府办公处所。“潘知府宫”西，群山屏障，东边，有“马家营”卫护，其北小溪有纵深腹地，布局得当。何时为州郡建置，有待新的证据。

由于它山堰建成之后，钟家潭、沙港等“古港”成为内河，与外洋不通，逐渐弱化了其经济、政治中心之作用，光溪的核心城镇位置也逐渐淡化。三江口起而代之，成为必然之趋势。当代考古专家把光溪、宝幢二地，作为宁波核心城镇考古课题，并得到国家级课题立项^①，是切中了宁波历史地理研究之肯綮。

奉化、余姚二江交汇西南岸区域选为县治之后，东津渡口骤然繁忙起来。

于是在东津渡头建桥，成为市民、县府热议之话题。所以治所之迁移，是催生灵桥之决定因素。对此需要加以探索。虽然乾道《四明图经》卷一《总叙》有曰：

穆宗长庆元年(821)，浙东观察使薛戎上书：“明州北临鄞江，地形卑隘，请移郡于鄞县置，其元郡城近南高处却安县。”“从之。”而移否莫得而知。

“移否莫得而知”说，则是拿捏不定之意。罗浚之宝庆《四明郡志序》也曰：

自明置州，至是四百三十三年，而城池之迁徙，县邑之沿革，人未有知其的者。唐刺史韩察实移州城，石刻尚存于时，且未之见。他岂暇详甚哉？作者之难，固有俟于述于后者也。

这些是宋代方志大家张津、罗浚等前贤之感叹、期待。我们既然把灵桥作为专题研究，那么这一催生灵桥之原动力，应该纳入探索的内容之一。于是不顾简陋，挤入“述于后者”之列，抛砖引玉，与学界共同检讨。使这一难题得以澄清。

^① 梅薇：《宁波地区古代城址考古获国家批复立项》，《宁波晚报》2013年4月20日A03版。